

罪恶的旧社会

4

押				柜
鋪	保	和	关	书
厘		金		制
錢				庄
洋	錢	和	大	洋、小
“法				币”
剪		刀		差
租				棧
房	屋	經	租	商

2138

罪惡的旧社会

第四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1/8 插页 1 字数 40,000

1966 年 3 月第 1 版 196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統一书号：4074·377 定价：(六) 0.18 元

編 者 的 話

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

解放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象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剥削阶级不劳动，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劳动人民終日为剥削阶级做牛做马，却是一輩子受苦受难。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們經常受人欺侮，遭到人身的迫害，沒有呼吸的自由；他們掙扎在飢餓綫上，經常遭受失业的痛苦，沒有生存的权利。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是說不完、訴不尽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經過长期的武装斗争，終于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且已經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新社会，劳动人民从过去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保障。随着伟大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他們說：“心里有个全中国，

心里有个全世界”。正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就能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为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整个过渡时期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有必要经常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罪恶的旧社会》(分辑出版)，介绍旧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概念，就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来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认识旧社会的黑暗和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今天生活的幸福，提高阶级觉悟。有人说得好：“不忆从前苦，哪知今日甜。”这套读物中所介绍的虽然都是过去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看看过去，比比现在，展望未来，就能激励我们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

由于我們缺乏經驗和现有水平的限制，书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意見和批評，幫助我們进一步提高这套讀物的质量。

1966年2月

罪恶的旧社会

统一书号：4074·377

定 价：0.18 元

目 录

押柜·····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組(1)
鋪保和关书·····	李允俊(7)
厘金制·····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組(13)
錢庄·····	謝菊曾(18)
洋錢和大洋、小洋·····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組(26)
“法币”·····	传 泗(31)
剪刀差·····	张守謙(38)
租栈·····	桂世杭(46)
房屋經租商·····	盛 文(55)

押 柜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

“押柜”，从字面上来看，不过是保証金的一种別称。有些人也許以为这只是旧社会一种普通的經濟现象，象租用东西要付上一些保証金这样的事。但又怎么知道，这也曾經是資本家剝削和勒索职工的一种手段呢！

在旧社会，不少資本家利用失业工人求职心切的心理，在录用职工时，要他們先交納一笔现金，叫做“押柜”或“保証金”，借口是防止职工因工作过失或行为不端，使資本家受到損失。这个借口是够荒謬的，对我们工人是莫大的侮辱。更可恶的是，在这个借口之下，資本家就可以肆意进行勒索。解放前，就有不少資本家用这种办法从許多失业工人头上搜括得大笔现錢，作为資本，开起店来，然后再进一步来剝削这些职工。

这里，我們可以从解放前的浴室、旅館、航运等行业来看看，这些資本家是怎样靠着残酷的押柜制度发家的。一九三〇年前后，上海有一个姓张的資本家騙得十来个劳动人民每人拿出一、二百元作押柜，他就用这一、二千元，先在福州路广西路口租下了一些房屋，再大招工人，从这些工人身上再勒索得五、六千元押柜，开起振华旅館。一九三二年，上海大流氓

謝葆生開設卡德池浴室時，一次勒索押柜就達一萬二千多元。一九二八年前後，三北公司新買一條“寧興”輪船時，從全體服務工人的身上勒索押柜接近該船買價二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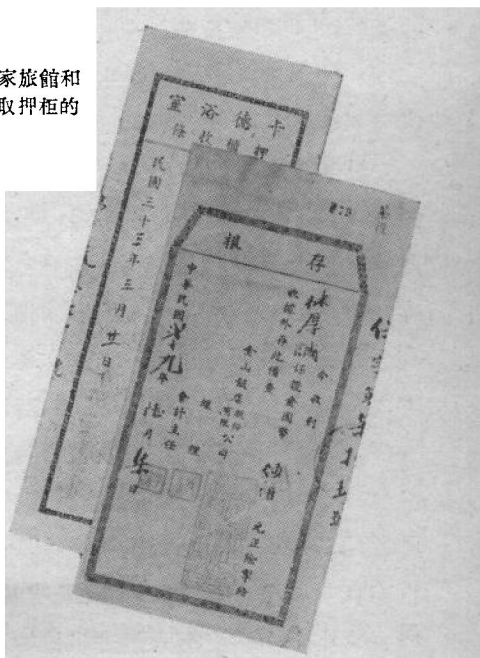
舊社會的勞動人民，平時在三座大山和資本家的層層壓榨下，已經難獲溫飽，一旦失業，更加瀕於絕境，哪里會有幾十元上百元錢來交押柜呢！但為了找到一個“飯碗”，還是得想盡辦法，典賣借當，忍受額外的剝削來交納押柜。杭州有一個姓陳的老年旅館業工人說：“解放前我借了一筆印子錢付給資本家當上服務工人，為了歸還這筆錢，後來不得不又另外借了幾筆印子錢，就這樣東借西還，有的還了幾倍，有的甚至還了十几倍，足足在印子錢中打滾打了二十年。”另外，有一個姓徐的工人說：“我在一九三七年向一個流氓借了一百五十元錢交付押柜當上服務工人，從此以後，這個流氓逼着我交付重利不算，竟還要一星期兩、三次到我服務的旅館里來要吃要喝，過年過節要送禮。我在旅館里受盡資本家壓榨，為了這筆押柜金又足足被這個流氓剝削了十二年，把省吃儉用下來的錢完全化在這上面。解放了，共產黨來了，才結束了我苦難的生活。”

有不少失業工人雖然想盡一切辦法，也湊不滿資本家勒索的高額押柜。怎麼辦呢？象抗戰前客輪上押柜金額很高，服務員就只能結合三、四個人，分頭典質借貸，張羅到一份押柜金額，舉一個人出面交納，以後他們就輪流上船工作，按股分派收入，每人分得一小份。這樣，杯水車薪，生活更加困苦。

資本家向職工勒索押柜，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

这是解放前一家旅館和
一家浴室向职工收取押柜的
单据。

资本家直接向职工勒索收取，象旅馆业、航运业就是这样。以抗战前的物价计算，旅馆业每一份押柜通常在一百元以上；航运业更高，一般在二百元以上。另一种方式是资本家先找到几个工头，由这几个工头分别承担押柜数后，再由



他们去招收工人。象浴室业资本家就是把浴室内各个堂口先包给“正堂”(浴室各堂口头目的称呼)，每个堂口的押柜金额自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正堂在招收工人时，就向他们每人收取一份押柜。这种方式从表面上来看，正堂似乎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代资本家介绍职工和收取押柜而已。实际上，大多数正堂和资本家都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当然不肯放过这一有利可图的机会。他们除了也采用向工人收取押柜的办法外，还在拆帐上玩弄花样。所以，也有一些正堂表面上并不向工人收取押柜，但由于他掌握着这个堂口的拆帐权，拆帐时就把工人应得的收入硬占去一大部分。据调查，解放前正堂

的拆帳收入約為工人的五倍。其他各種名目的花樣還不計算在內。所以浴室中的正堂往往也就是資本家的合夥人，共同參與對職工的剝削。

這些資本家在招用工人時，從他們身上勒索了一大筆押櫃後，是不是就到此為止了呢！當然不會就這樣感到心滿意足的。工人進店後，資本家除了平時剝削他們的勞動外，還巧立各種名目，一次又一次地增加押櫃。如卡德池浴室資本家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〇年這九年中，曾借口“虧本”勒索了四次“加押”，每次總數約值米八百担左右。金水浴室大修理一次，資本家要正堂加十担米；日新池浴室每修一次鍋爐要正堂加五十担米，正堂又都攤給職工。資本家挖空心思製造勒索押櫃的借口竟還無恥到這樣的地步：象原洛德池的資本家買汽車和收音機也要“加押”，說是收音機大家可聽、汽車大家可坐，事實上當然沒有人能去坐他的汽車和聽他的收音機。在物價飛漲時，不少資本家還異想天開地把早已勒索到手的押櫃說成是也在貶值。以此作為理由要職工補交押櫃。

以上這些所謂加押，是資本家巧取豪奪的又一種手法。押櫃已經由初期的一次性勒索，發展成為對職工進行無休止勒索敲詐的手段了。

有的人也許會問：這些工人在進店前為了交納第一次押櫃，已經弄得典盡賣絕，十之八九欠下了一身高利貸。那里還有什麼錢來應付這些貪婪的資本家一次又一次的敲詐勒索呢？

確實如此。有不少職工好不容易拼湊了一筆押櫃，進了

店，后来就是因为交不出“加押”而被开除出店的。但是資本家除了以解雇来威胁职工外，有时为了免得因开除一批职工而影响营业，常常采取“冻结小帐”这种更为残酷的办法。象天泉浴室有一次“加押”，竟冻结小帐一个月，全部充作押柜。解放前，这些服务行业的职工，一般都没有固定工资，主要是依靠分拆小帐来维持生活的。如以抗战前后的币值计算，浴室工人每天拆得的小帐一般只在三、四角之间，营业好的时候也只有五、六角。他们辛勤劳碌一天所得，已经难以养家活口。遇到“冻结小帐”，生活就更濒于绝境。

押柜名义上是可以退还的，但事实上資本家又怎么会把已到手的钱还出来呢！所以，他们总是借口种种原因和耍尽各种手段吞没押柜。过去有几家旅馆，資本家把店偷偷盘给别人，就拒不见面，职工的押柜就此没有下落。金水浴室的資本家对离职职工，一直凭着恶势力不退押柜。卡德池的資本家则明文规定违犯店规没收押柜，职工离职，他就可以随便加上一个违犯店规的罪名，侵吞他的押柜。有些押柜即使退还给你，也被資本家无中生有地造出许多理由，来个七折八扣，什么过失罚薪啦、赔偿生财啦、用具折旧啦、呆帐损失啦，等等。这样，就是退到手，也是微乎其微了。再加上通货膨胀，领回后亦同废纸。象浴德池一九四八年装修内部时向职工收取了价值二千担米的“加押”，后来经过职工斗争发还时，已只及当时的百分之一了。

資本家勒索押柜，依靠了工人的血汗起家，反过来再残酷剥削工人，大发横财。这一系列的罪恶勾当，都是通过押柜制

度来实现的。无疑，押柜制度是資本家为了达到其随心所欲地剝削工人而“創造”出来的一种赤裸裸的吃人制度。

解放后，押柜制度被連根鏟除，服务行业也早已逐步废除了拆帐制度，改为固定工資。职工的收入有了保障，生活得到根本改善。但是他們永远不会忘記曾經給他們带来过悲惨生活的押柜制度，更不会忘記造成种种罪恶、使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旧社会。

鋪保和关书

李 允 俊

在旧社会,工人要在工厂或商店里找个工作,那真如登天一样的困难。那时候,有些工人虽然很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这并不等于马上可以就业,还必需觅得“鋪保”,填具保証书后,才能被資本家所雇佣。

資本家为什么要工人在进厂或进店时觅个鋪保呢?原来資本家爱财如命,总想尽量剝削职工,但又怕职工不為他們卖命,于是,就要就业的工人交一个质押性质的鋪保,来束縛住职工,好让資本家尽情地驅使职工。所謂鋪保,就是要一家或数家的商鋪出面,为就业的工人担保。担保的内容通常有:鋪保人应保証被保人进厂或进店后能循规蹈矩、兢兢业业地为資本家干活,如违犯厂规或店规而使被保人所在的工厂或商店遭到損失时,負有賠償的全部責任等等。照理工人靠劳动吃飯,根本就用不到什么鋪保。这一套办法是資本家故意弄出来的花样,想借此来压榨工人。資本家借口不能相信新来的工人,要工人进厂、进店前先交鋪保,更是对工人的一种侮辱。

那时,工人要找到鋪保,可难哩!商鋪老板当然不会白白

替工人担保。工人为了求个鋪保，就非得借借当当，拼拼凑凑，挽亲觅友，向商鋪老板送錢送礼物才行。因此，工人还没有进資本家的工厂、商店，就得先受到鋪保老板的一番盘剥。

在旧中国，有些資本家要求工人觅的鋪保，还不止一家，而是要有两家，甚至三家；同时，对作保商鋪的資格，也有相当的规定。一般地说，必須具有比較雄厚資本的南貨号、百貨店、綢布庄、銀樓等，才有充当鋪保的資格，至于一些資本不多的老虎灶、理发店、裁縫鋪、小烟紙号等，都不是資本家所能接受的。由于資本家对鋪保的苛刻要求，不少工人在找鋪保的过程中，真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周折，受尽資本家的多少閑气。如在一九四六年，有一个姓宋的工人，好不容易在湖南电气公司（即现在长沙电厂的前身）找到了一个工作，他立即筹錢送礼，到处求人，找了一家鋪保，填具了保証书送到厂里，满以为就可以进厂工作了。那知道这个厂的資本家却說：“一家鋪保无效，起碼三家。”这位工人能找到一家鋪保，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今資本家要他再多找两家，那更是难上加难了。但不找又进不了厂。于是，他只好再去借了高利貸，备了礼物，托熟人再去找鋪保，才又找到了一家鸡鴨鋪和一家雜貨店作保。他以为这次总可以了，又满怀希望地去见电厂的資本家。可是，資本家却冷言冷語地說：“你就不能找几家大一点的店鋪作保証人？”姓宋的工人向他訴說了自己的难处。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得到的答复是：“找不到，就不要进厂，期限是三天！”没有办法，这位工人又只能不分昼夜，东奔西跑，有时連飯也吃不上，忙着借錢、送礼，托人找鋪保。最后，

真不知道又托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总算找到了三家說得上大一点的商鋪作保，闖过了找鋪保这一关。

工人在找鋪保的过程中，已經受尽了資本家的盘剝和刁难，而在找到鋪保进了工厂、商店后，为了保住这个飯碗，除每时每刻要遭到雇佣他的資本家的压榨外，还必須在逢年逢节的时候，向鋪保老板送錢送物，受着他們的剝削，否則就会不太平。例如，解放前，上海祥生汽车公司有一位姓刘的司机，在某年中秋节，实在无錢向鋪保老板送礼，那位鋪保老板一气之下，就要去祥生公司退保，逼得这位司机只好到处告貸，結果湊了二十块錢送去，方才了事。

上面所談的两个事例，在旧中国絕不是个别的，实际上当时社会中千千万万工人为了找工作和取得鋪保所遭遇到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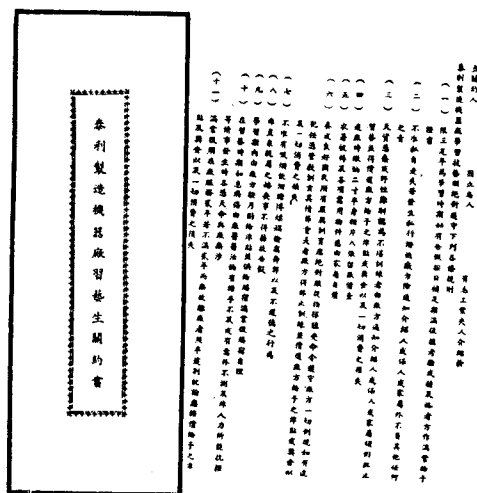
在旧中国，資本家雇佣工人，规定得先有鋪保，至于学徒，除了和工人一样需要鋪保之外，又规定必須訂立“关书”（又称“关約书”或“学艺契約”）。所謂关书，那不仅是对学徒的人身侮辱，而且簡直是学徒的卖身文契。为什么这样說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九二二年河北邢台的一家鞋鋪学徒的父亲被迫与資本家訂立的一张契約：

“立字人××，因家貧人多，无法度日，情愿送子××
×到邢台文盛德鞋鋪当学徒。經×××說合，言明四年
为滿。擦桌扫地，提水做飯。只許东家不用，不准本人不
干。学徒期間，无有身价报酬。学滿之后，身价面議。如

有违犯鋪規，任打任罵。私自逃走，罰米拾石。投河奔井，与掌柜无干。空口无凭，立字为証。”

从上面这张契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徒在学艺(其实是被資本家当牛马使喚)期間，既不許不干，又无分文工資報酬，任凭資本家剝削、打罵，甚至被逼死，也与資本家无干系！这怎么不是一张道道地地的卖身文契呢？也許有人会說，这样的卖身文契只会出现在如鞋鋪那样小的手工工场吧。不，即使在大的資本主义工厂中，这样的卖身文契也同样是存在的。如解放前上海有一家大隆机器厂，它是当时上海机器制造业中数一数二的資本主义大厂，該厂招用的学徒，經常占着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大隆机器厂(当时

“大隆”的資本家把厂部迁入租界，托庇于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下，并把厂名改称为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制訂的学徒关約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学徒在进厂时，必須繳納杂費十



这就是泰利制造机器厂(即大隆机器厂)同学徒訂立的关約书。